

民国儒商荣德生的散财之道

■ 盖中辉 陈雁雁

“

荣德生(1875-1952),江苏无锡人,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荣毅仁之父,民族工业巨擘荣宗敬之胞弟,是中国民族资本家、慈善家、实业家,也是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。从事纺织、面粉、机器等工商业60年,荣德生享有‘面粉大王’‘棉纱大王’的美誉。

在发展实业的同时,荣德生兴办了大量公益慈善事业,领域涉及路桥、公园、职工教育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图书馆、文物保护等。在40多年中,荣德生把慈善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生逢乱世,尽管一生起伏不断,但荣德生始终坚持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对待财富和支配财富,使得慈善成为了财富的归宿。

重视教育 创办学校

1904年,荣德生三十而立,思量着要对地方尽公益义务之责,他与族人发起捐资,创办了公益学堂(1906年改为公益小学),由此也开启了他40多年兴办教育的公益之路。荣德生兴办的学校从小学至大学一应俱全,经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不下万人。因学校收费极低,为许多贫穷之家的孩子提供读书机会。

荣德生注重实学实用,他认为“教育贵在实学,若虚有其名,无裨实用,不如无学”。1906-1918年,他先后创办了四年制的公益小学四所,两年制的公益小学两所。这些公益学校学费低廉,如公益第一小学高级班学费5元/学期(贫苦者免),初级班学费3元/学期(贫苦者免)。这些学校为很多农村学子提供学习机会,对当时无锡附近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在晚清时期,一些实业家在西方公益思想的影响下开始重

视女子教育。荣德生主张女子“求诸学问技能”,以达到“先在经济之能独立,不赖男子以生存”。1908年,荣德生创办了毓化女校,并且先后创办四所,以足补公家之所不及。

1919年夏,荣德生成立的一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,从高小毕业生中招收学员,先经过一年预科,然后进行分班教育,共有工、商两科,学制3年。工商中学共创办8年,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,如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、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从该校毕业。

1947年,年过六旬的荣德生创办私立江南大学,江南大学下设文、理、工、农三个学院九个系,学制四年。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一所正规本科大学,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。在《师友杂记》中他对荣德生有这样的评价:“其(荣德生)日常谈吐诚恳忠实,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,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,乃俨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,话语皆直吐胸臆,如见肺腑。”钱穆说,荣德生这么重视文化教育、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,但是其个人生活如吃饭衣着却是“节俭犹如寒素”。

当时的教育西式学堂已经取代了传统教育,四书五经连同科举被一并取缔,对此,荣德生认为当时“人才教育”无法取代“公民教育”,前者以知识和技术为主,后者则是道德教育和品格的养成。为此,荣德生决定将旧式书院与新学的科目相结合,编



坐落在无锡荣氏梅园中的荣德生铜像

传统文化的通俗读本,取名《人道须知》,他亲拟大纲,请前翰林江霄纬和荆梦蝶两位精通传统文化的宿儒老先生执笔编写。前四卷“孝悌”“忠信”“礼义”“廉耻”,成书于1927年,后四卷“家庭”“生活”“自治”“处世”,成书于1930年。

修路造桥 教重于贍

荣德生认为,教育尤事业之母,交通为地方命脉。1928年,荣德生出资修建开原马路,“开原乡自开辟马路以来,交通便利,行人颇受其益”。此后,又先后修筑了通惠路等公路。在修筑公路的同时,荣德生成立百桥公司,捐资建造百余座桥梁,其中他最看重的是1934年建造的横跨蠡湖的实业长桥(又称宝界桥)。当时荣德生六十大寿,“亲友赠送寿礼折款6万大洋,捐建此桥,时称‘江南第一大桥’”。

作为终身学习者,荣德生不仅自己热爱读书,还希望让更多人读上书,读好书。1912年,荣德生开始筹建图书馆,历时4年,于1916年落成,取名大公图书馆,意在“示不私天下文化利器,愿以公之大众也”。他搜罗购买各种书籍,到抗战前大公图书馆已藏书20万卷,多为善本。抗战胜利后,他又出资补购10余万卷,使之成为无锡地区最大和最早的私立图书馆,不仅为当地人提供免费阅读国内外书籍,而且保存大量珍贵历史文献。

荣德生也参与救灾、施米、施衣等传统善行,但他认识到这种临时性的救济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荣德生在自传《乐农自订行年记事》中写道:“余以为创办工业,积德胜于善举。慈善机关周恤贫困,尚是消极救济,不如积极办厂兴业,一人进厂,则举家可无冻馁;一地有厂,则各业皆能兴旺。”授人以鱼的物质救助帮得了一时,教育与实业才能授人以渔,才能助人自助。这就是“教重于贍”的原因,(教育胜过贍养)。这接近现代公益的理念,类似“赋能”。



私立江南大学全貌

家庭熏陶与文化滋养

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重视家风和教育,特别重视人格和品德的培育。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为人仗义,遇事从不推诿。他常说:“治家立身,有余顾族及乡,如有能力,即尽力社会。”正是这种推己及人而至国家社会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荣德生。

荣德生创办实业的初衷,并非为追逐财富与私利。钱穆在《师友杂忆》中所载荣德生亲述的一件小事,可为佐证。某年,荣氏兄弟及乡友在杭州晚餐之后走出饭店,被一群正值壮年的乞丐环侍争赏,这令荣德生感慨不已,立刻跟大家一起商议决定设厂招工,让更多人能够就业。可见,荣德生有理想抱负而又真诚务实。

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使得荣德生能够不断超越个人而关怀社会、超越财富而追求更高精神价值。品读荣德生在梅园中所收藏或题写的匾额和楹联,可以更好地感受他的精神层面所向往的境界:“以善济世”,“发上等愿,结中等缘,享下等福;择高处立,就平处坐,向宽处行”……荣德生虽是商人,却有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家国理想,能力越大就为社会担当更多责任。

中西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式散财之道

荣德生所生活的时代,是美国基金会产生的时期。如果把荣德生和卡耐基做比较,看似不相干的两人,居于地球东西两端,文化背景完全不同,彼此也没有交流,但他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。

他们所处年代相当,都工作很早,少时没读多少书。卡耐基9岁工作,15岁就成了熟练的电报员;荣德生在农村,14岁出来工作,从管理账务的学徒开始;后来他们都从事实业,成了大实业家。他们都很能赚钱,也善于做慈善,选择慈善的领域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卡耐基在《财富的福

音》中写到了公益捐赠的最佳领域:一是建立大学;二是建立免费公共图书馆;三是建立医学实验室;第四个是建立公园;最后一个就是捐赠教会。除了医学实验室,两人的公益慈善领域基本一致。

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都在年富力强的时候,就开始寻找财富的归宿,那背后的理念是什么?卡耐基所代表的是基督教对于财富的观念。基督教认为财富并不属于某个人。卡耐基的著作《财富的福音》做了更清晰明确的阐述:“如果你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任务,你就有责任对财富进行管理,而富人的责任是树立一个俭朴不张扬的榜样,避免炫耀奢华,只要满足恰如其分的合理需求就可以了。”所以卡耐基在临终的时候,将他的巨额财富只留给家人一小部分。其余被委托管理的这笔财富,有责任要用在深思熟虑的、断定能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上。

荣德生受传统文化滋养甚深,在他身上体现出个人与社会、财富与精神的统一。自小接受传统教育,一生奉行儒家道德,荣德生追求的不是个人成功,而是推己及人,帮助每一个人有机会“自立”。荣德生既是实业家,又是慈善家,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他做事情的方式和背后的精神。

资中筠先生在《财富的归宿》书中写道,财富本身不是目的,它也需要有归宿。财富的归宿,其实是人的归宿,财富只有工具价值,而人要有终极关怀,换言之,就是对世俗社会和现实人生的超越,就是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寻。

儒家追求三不朽: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这三者可谓是儒家对有限人生的超越,对于自我中心的超越。荣德生和卡耐基都是大实业家,可谓立功;都是大慈善家,可谓立德;都有著作和言论传世,卡耐基有著名的《财富的福音》,荣德生有《人道须知》,可谓立言。三者都具备,可谓不朽的人生。

(据“敦和基金会”微信公众号)



近代最大的私立图书馆之一——大公图书馆